

重温乒乓岁月 铭记总理嘱咐

——访乒乓名将郑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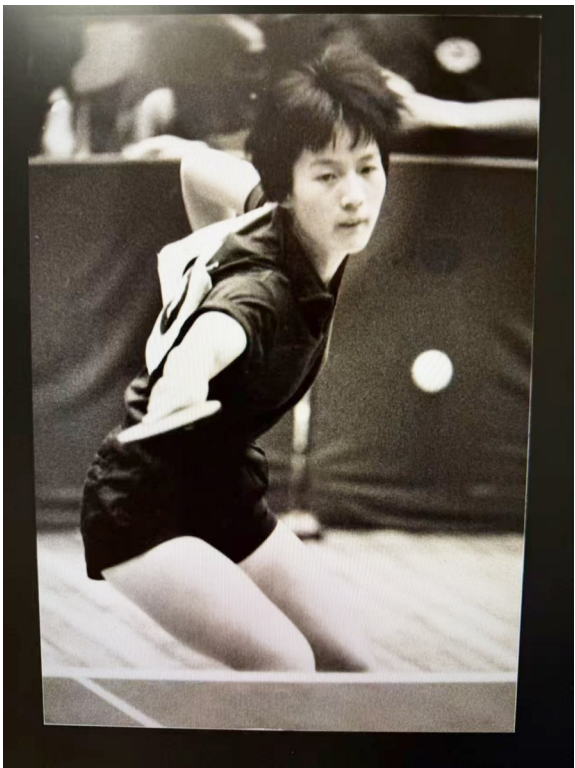
谈 天

2月26日下午,淮安区周恩来文化研究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乒乓球前世界冠军郑敏之。虽历经岁月沉淀,但这位昔日在乒坛上叱咤风云的健将,如今依旧精神矍铄,风采丝毫不减当年。

我们有幸对她进行了一次专访,一同走进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乒乓人生,聆听她与周总理之间那段鲜为人知却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初露锋芒,为祖国荣誉而战

回忆起自己的乒乓球生涯起点,八十岁高龄的郑敏之眼中闪烁着光芒,她说小时候就是单纯的热爱,拿着球拍在球台前就感到无比快乐,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



1971年,郑敏之在第31届世乒赛比赛中

军。

1961年,郑敏之在全国比赛中战胜了世界冠军丘钟惠,这无疑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让她开始崭露头角。1963年她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与张燮林合作打败了当时的世界混双冠军——日本选手荻村一智郎和松崎君代。郑敏之谦虚地说,当时自己年轻,就是拼尽全力去打,和队友配合默契,才取得了胜利。

1965年,是郑敏之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之一。她与林慧卿、李赫男组成的中国女队战胜日本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让世界见证了 中国乒乓球的崛起。1971年,她与林慧卿在第31届日本名古屋世乒赛上获得女双冠军。她感慨地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胜利,而是团体的胜利,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要为国家争光,团队的凝聚力和拼搏精神让我们成功实现了突破。”

“唯有不懈努力,方能不负祖国的期望。”那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她说国家给予了她们极大的支持,特意从日本聘请了教练,每日的训练从未间断。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温馨的画面:练球间隙,她匆匆跑去捡球,周总理见状,亲切地提醒:“别跑,别跑,小心摔倒了。”这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让郑敏之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关爱与温暖,也成为激励她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这届世乒赛意义非凡,小小乒乓球带动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郑敏之有幸成为乒乓外交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从世乒赛归来的国乒队员们,并邀请他们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



周总理与郑敏之在中南海西花厅打乒乓球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但郑敏之回忆起那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的场景,依旧激动不已。“在天安门城楼上,陪着毛主席向前走的周恩来总理突然叫我的名字,‘郑敏之!郑敏之!’叫了好几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总理在叫我。他在人群中找到我,把我一下拉出来,带到毛主席的面前介绍说,‘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郑敏之,他们刚刚从31届世乒赛回来。’”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后来,邓颖超还搂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们的小球震动了地球啊。”

“当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小球震动地球’的含义,也不知道世界要开始变化了。”郑敏之感慨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运动员。虽然当时刚刚拿了冠军,但也是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获得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能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一定有更深层

周恩来：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胡长明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孔子对“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贤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依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他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甘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4·12”政变周恩来是如何被捕的？

闻 宁



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当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如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键时刻,是一位名叫鲍靖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挺身而出救了他。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起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乃是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

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落在地。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只身一人前往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并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一间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

次的原因。”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正式访华。这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团体,并受到了尼克松的接见,郑敏之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也让乒乓球成为了连接世界的友谊桥梁。

总理嘱咐 铭记一生践行

周恩来与故乡淮安展览室内,一幅幅展示周总理与故乡淮安千丝万缕渊源的史料照片,郑敏之看得认真仔细,久久驻足,沉浸在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与无限敬仰之中。她动情地说:“周总理付出的爱最多,得到人民的爱也最多。我家里放了很多周总理的照片,看到照片就会想起周总理对我的教诲”。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日办公与生活的地方,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是他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的场所。一次,周总理听闻郑敏之在京,便邀请她到西花厅打乒乓球。郑敏之怀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赴约,走进西花厅,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总理,紧张感顿时消散。两人你来我往,小小的乒乓球在球桌上跳跃,“乒乓乒乓”的击球声在房间里回荡。打球间隙,周总理询问她训练和生活情况,鼓励她继续努力,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

“总理是一个对待每个人都 very 真诚的人,他的眼神能让你觉得他是在用心看你,同时还让你不觉得拘束。”在郑敏之心中,周总理是个可亲可敬的人。周总理殷切希望运动员退役后仍能为社会贡献力量,做有意义之事。这些嘱咐,郑敏之一字一句都铭刻于心。

退役后的郑敏之,依然活跃在乒乓球领域,为乒乓球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创办了敏之体育文化交流中心,资助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敏之杯”中小学乒乓球锦标赛自1994年举办第一届后,每年举行。她还组织了“乒爱心”义工队,每周去教自闭症孩童打乒乓球。在这支义工队中,郑敏之让每个人都写下一句自己的座右铭,她给自己写的是“爱与奉献”,“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她说。

“我想他,真的很想他,感觉周总理就活生生地在我面前。”采访中郑敏之哽咽着,思念之情难以抑制。2008年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她参与淮安的纪念活动,指导少儿乒乓球训练。如今虽已80岁高龄,她仍怀揣心愿,渴望为周总理家乡贡献力量。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7周年之际,在周恩来红军小学举办“敏之杯”乒乓球联谊赛。郑敏之说:“我们乒乓人,没有忘记老一辈的谆谆教导。”

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学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鄧惕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鄧惕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 he 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鄧惕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鄧惕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鲍靖中曾在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团任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后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周恩来陪苏加诺总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联系,他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感谢和问候。一年后,周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鲍靖中的起居。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机关所在地——上海总工会